

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向

裴晓涛

(郑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 451200)

摘要: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传统文化面临失序危机,乡村文化自信面临严峻挑战。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要认同乡村文化、尊重乡村文化、弘扬乡村文化,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重构乡村生态空间、文化空间、舆论空间、主体空间和产业空间,形成健全的乡村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新型农民和新乡贤文化,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乡村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化振兴;乡村治理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智库研究项目“应用型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实践探索”(2021-ZKYJ-18);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性计划(2022-ZZJH-335)。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3-0107-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3.009

党的二十大在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了总体部署,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3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相比,乡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处于弱势地位。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更为重要。因而,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径,对于改善农民和农村的精神面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进而助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历史伟业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基础与问题提出

乡村文化通常指乡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民俗风情、传说故事、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技艺、古建遗存等要素形态,表现为价值取向、道德尺度、情感归宿、乡民心理、风俗习惯等精神活动及其物态。乡村文化凝聚着乡土人文之美,是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托和人生意义所在。

学习和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推进和深化未来研究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一
作者简介:裴晓涛,郑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乡村振兴。

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论题,但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相关研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才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论域。梳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乡村文化振兴的相关研究在时间跨度主要经历两个阶段,2017年至2020年,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家相关政策的解读、对乡村文化振兴科学内涵的探析和阐释;2020年至今,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析和讨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方略。具体来看,学术界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统领未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发展^[2],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3],但不能为资本下乡、城市富人下乡提供市场通道^[4],应全面认识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和价值^[5],加快推进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国家总体发展的历史前提和时代基础条件下,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战略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重要的文化基础之一。

二是对乡村文化治理能力的研究。乡村文化振兴具有规定、影响和塑造乡村各个方面能力结构的决定性作用,乡村文化治理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决定性意义^[6]。有学者建议从权利、权力性质、制度及效率等层面理解和阐释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和意义^[7],从根本上看,要实现文化振兴的前提是实现乡村文化从自省到自信的转变,从而促进乡民文化意识的觉醒。

三是乡村文化遗产研究。学者多集中在对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其中传统村落研究主要侧重传统村落价值活态传承^[8],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9],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10]等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主要侧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1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12]等方面。作为村落物态表达实体的物质和乡村生活活态体系的非物质,这些文化遗产“构成了促进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而强大的力量”^[13]。

四是对乡村文化振兴的乡风文明研究。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学者们大多将科层制和乡村社会逻辑相结合,对乡村移风易俗^[14]、乡村生活空间^[15]、公共伦理文化^[16]和家风家训与伦理关系^[17]等进行重点研究。乡风文明是乡村文化的软实力,是乡村文明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灵魂所在。尤其是其中的礼俗文化,这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是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方案研究。学者多从乡村文化共同体^[18]、乡村文化自信^[19]、乡村文化振兴策略及路径^[20]等方面进行研究。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就是要先唤醒乡村社会主体的文化觉醒,积极挖掘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铸魂作用,利用好乡村文化的多重价值,建构富有活力的乡村生活方式。通过建设乡村文明,增强乡村文化自信,“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21]。使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契合,最终使乡村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精神支柱。

文化作为乡村振兴的灵魂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是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振兴的精神思想动力^[22]。在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建设农业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乡村的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愈加凸显、日益重要,贯穿于乡村由外到内、由形式到内容、形神兼备的深入发展和全面提升之中,促进文化振兴已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乡

村文化振兴中尊重文化差异,传承历史文化传统,融入现代文化元素,注重同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增强文化体验感,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21]。乡村文化凝聚着乡土人文之美,是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托和人生意义所在。在建设文化强国、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使其兴盛起来,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

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振兴乡村文化是一项艰巨而持久的历史任务,没有对乡村文化价值的广泛共识、深度认识和高度重视,会导致乡村文化振兴失去内生动力和发展信心。当前乡村文化供给面临着供需结构性失衡、文化供给形式化以及文化供给碎片化等诸多实践困境,不利于乡村文化的有序稳定发展^[23]。还应该看到,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等问题。“一些村庄‘形虽在,神已散’,优秀道德规范、公序良俗失效,不孝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则、不睦邻里等现象增多,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盛行。”^[24]^[236]乡村传统文化面临失序危机,乡村文化自信面临严峻挑战。

(一) 承载乡村文化的传统村落急剧消失

在城镇化扩张过程中,简单化地将“城市”置于“乡村”之上,甚至在治理实践中出现“祛乡村化”现象,导致一些传统村落日渐凋敝,有的惨遭破坏,有的永久消失,乡村文化正在面临弱化的危险。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比上年末提高0.94个百分点^[2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村落数量急剧下降,一大批具有传承价值的传统村落消失殆尽^[26]^[6]。传统村落的终结意味着诸多村落文化将面临无处生存的困境,尤其是传统村落中的祠堂等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色彩逐渐褪散,农民对集体观念和公共精神认同感日益衰落^[27]。乡村文化形态发生急剧裂变,内在结构也面临着肢解的危险。一些地区的农村空心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作为文化载体的传统村落逐渐消亡,乡村传统文化逐步淡化。

(二) 乡村文化的局部破败及明显断层

全国范围看,传统村落类型复杂、分布分散、差异明显,呈现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三大地带差异明显,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长江中游地区次之,不易集中管理和保护。传统村落传承着历史的文脉,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依托传统村落开发乡村旅游,是目前大多数村落的做法。但伴随乡村旅游的扩张,呈现出乡村旅游过度开发、商业气息较为浓厚的不良倾向,破坏了村落的原始生态,冲击了原有的民族风俗,打乱了传统村落的风土人情。部分地区城镇化建设急功近利,打着保护的旗号照搬大城市发展模式,盲目扩建、相互模仿、千篇一律,既有的村落文明被破坏和遗弃,造成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断层,使得传统村落的发展特色和

精神内核发生变化。不少传统村落的特质文化被贴上了商业的标签,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遭遇侵蚀、污染,导致原居民对世代固守的传统文化观念乃至道德操守产生了怀疑,内在的精神信仰、原有的文化成分和结构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一些原居民在村落文明保护过程中的意识淡薄,自行拆建古村落和古建筑,对内在的传统民俗知之甚少,乡村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的代际传承式微及明显弱化,致使乡村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较为严重。

(三)乡村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相对比较匮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需要,而乡村文化振兴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28]。“社会的变迁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现代社会变迁的源泉主要在于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变迁迫使文化的其他部分也跟着发生变化,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29]¹³⁶⁻¹³⁹ 由于中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新兴城镇文化及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带来的极大冲击。乡村文化空间是一个包含自然、观念、资源、社会、政治等不同文化种类的多元化空间。正确处理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形成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文化生态效益的最佳组合^[30]。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关系日趋疏离,所承载的公共权威趋于弱化,所承载的集体记忆逐渐被淡忘^[31]。目前,乡村文化生存和发展空间相对比较匮乏,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由于乡村落后的经济发展态势,缺乏后续的发展力量,导致乡村文化传承与弘扬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空间。二是由于青少年入城,逐渐与乡村疏离。青少年因少小离家外出求学就业,与乡村长期疏离,对因土而生的乡土文化缺乏感情认同,对乡土文化缺乏完整的记忆与体验,不具备父辈对山水林地田园系统的认知,也不可能从乡土文化与乡土社会、乡村振兴等高度去进行文化判断^[32]。三是乡村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中国传统工艺凝聚着历史的“技艺”与“记忆”^[33]。现代乡村进入老龄化阶段之后,由于青壮年入城务工,他们的手工艺将无法传承下去。四是最具乡村文化代表的建筑物倒塌,传统的乡村文化失去了物质载体。五是传统节日文化逐渐消失,以往乡村过传统重要节日时有舞龙灯、吃元宵、品月饼等习俗,家家户户一起欢呼庆祝,这种传统乡村文化逐渐丧失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

(四)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文化认同出现危机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空心化日益加剧,导致文化物质载体——传统建筑坍塌、具有非遗性质的民俗文化后继无人、乡村人口逐年减少等现象越来越普遍,从而导致乡村记忆与认同危机的产生。随着市场化的持续发展,部分乡民热衷于追逐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失去了自己人生的道德标尺和价值导向。乡村社会的人伦秩序和差序格局受到外界冲击,乡村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减弱,乡村文化秩序遭遇认同危机,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自然生态秩序因过度开发而缺乏保护,文化秩序因年轻人逃离而后继乏人,公共生活秩序因赌博、色情、黑恶势力盛行而乱象丛生,心态秩序因传统的乡村伦理秩序瓦解而陷入迷乱^[34]⁵⁹。大批农村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忘却了过去事情记忆的勾连和情感寄

托,想从以往的文化中解放出来,融入现代城市文明中去。然而,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务工群体与外界进行的交往非常有限,产生了原子化的人际关系,遭遇了“文化移民”的困境。尤其在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地方,强势的城市居民看不起甚至歧视于农村外来人口,强化了乡民的自卑情结及文化自卑感。“时至今日,村落面临的危机在本质意义上是村落传统文化被现代化彻底消灭的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将要被切断的危机,村落及其传统文化一旦走向衰亡,中华民族将面临不可挽救的深重危机。”^{[35]795}可见,乡村文化面临被现代都市文化革替的可能,乡村文化认同已不复存在,其文化冲突与断裂造成社会价值认同的缺失,重新建构乡村文化认同路径已迫在眉睫。

三、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向

乡村历来是人们栖居和文化生长的家园。当前,农村是近5亿农民常住的家园,现代化越往前走、物质生活越丰富,人民群众越喜欢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文化传承的功能就越能发挥积极作用。“以文化自觉来认识传统村落以及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以文化自信来肯定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要义,以文化自强来发展有益于世界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35]802}丰富和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对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一)重构乡村生态空间,加大传统村落文化保护

2012年,国家开始从真正意义上全面保护传统村落,并颁布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传统村落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在某一地域修建房屋建筑后长期定居下来从事生产、生活形成的自然聚落,一定规模的建筑或建筑群是传统村落形成的重要标志。“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24]100}保护传统村落不能忽略的关键性因素是文化。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核心,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摒弃粗放式发展理念,增强传统村落保护意识,将传统文化及村落保护列入规划范围。

从物质文化层面而言,振兴乡村文化重在加强对传统村落的挖掘和保护,加强对乡村文物古迹、传统建筑以及民间文化活动场所等的整理和保护。自2012年开展全国第一次传统村落摸底调查开始,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已公布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8155个村落。虽然部分村落已经得到有效保护,但受经济水平、技术发展、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全国范围内仍有一大批传统村落未被发掘出来。传统村落保护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对实体空间进行整饬,还涉及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36]。因此,应突出传统村落特色及发展优势,加大传统村落保护保障力度,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传统村落清查摸底工作,加大传统村落的发掘、鉴别和认定力度,用新技术、新手段、新理念建立传统村落数据库,探索搭建村落文明保护的数字展览馆,实时反映传统村落保护状况,以更好延续乡村文明血脉。“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

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24]64}近年来,沿海、沿江城市格外注重发掘本土文化的积极因素,如青岛市立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整合传统村落雄崖的古遗址、古建筑、古村等文化遗产,建设“三湖、两河、一山”民俗文博旅游线路,打造“青岛之源、寻根即墨”遗产旅游空间,协调推进遗产旅游空间开发、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态环境^[37]。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而言,振兴乡村文化,重在加强对优秀传统曲艺、民间工艺美术、传统节庆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积极借助现代技术、现代创意等呈现传统文化,推动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文化的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在当下全面践行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背景下,民俗遗产不仅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催化剂,同时也是缔结乡村共同体结构关系的黏合剂、构建乡村公共记忆的稳定剂^[38]。因此,要重塑村落市场生态,开启乡村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39]。长远看,保护传统村落,传承村落文明,需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保护机制,保障传统村落保护有法可依。国家及各级政府虽然出台了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指导意见,但缺乏国家层面的专门性法律,弱化了保护的强度和力度。这就需要尽快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明确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原则和路径。“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24]64}发展和振兴乡村文化不仅要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更要尊重乡民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培育乡民保护传统村落的责任感,让乡民真正了解村落文明的内涵及价值,引导他们利用科学方法对待乡村文化及村落文明,形成全社会支持参与的浓厚氛围,让耕读文明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二)重构乡村文化空间,实现乡村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乡村文化空间是认识和辨别乡村传统文化的坐标原点和文化印记,通常是指进行礼仪、节庆、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等的空间,表现为生活方式、民间传说、价值观念、精神面貌、文化精髓、宗教信仰等。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有序推进,许多乡村地区新建了体现传统文化元素的文化大礼堂、文化大院、文化广场等,有些地方还建了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博物馆、展览馆等,一些传统节庆文化浓郁的地方还建了戏台子,并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送戏下乡,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比如,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一点多心”服务建设将个人泥塑工作室纳入“联盟成员单位”,每个周末,对社区泥塑爱好者授课、培训、切磋技艺,推动了地理空间的自然特征与历史空间的文化传统相结合^[40]。浙江、山东等地区依托“乡村记忆”数字化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工程,保留和再现民俗节日、建筑遗址、资源环境、地方特色、姓氏溯源、民间传说、方言祖训、历史变迁、人口迁移缩影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时空载体^[41]。调查发现,乡村有线广播,特别是乡镇自办节目,由于地域上的接近性、内容上与乡民日常生活的相关性,逐渐成为凝聚、聚拢乡民文化认同的主要力量,深受乡民青睐,逐渐成为传承、建构乡村文化的重要媒介之一^[42]。

乡村文化传承不是简单地照搬复制,要根据新的时代特点进行创新,需重点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优秀乡村文化蕴含的崇尚自然、诚实守信、邻里和睦、勤劳俭朴等精神特

质,加强古镇、古村落、古民居和古树名木保护利用,打造一批叫得响、过得硬、有影响力的农村民居典范,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同时,通过兴办儒家讲堂、孔子学堂、农民夜校,建设农村图书馆和农民书屋等,将根植于民族沃土的优秀乡村文化传承下去,特别是增加非遗传承人产品创新能力,支持乡村发展非遗项目,使人们的文化需求、精神需要得到满足。

农民进入城市,面对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工作节奏的变化,会有诸多不适应。对城市管理者而言,要构建城乡一体的文化体系,协调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文化冲突,解决农村人口进城后的文化认同问题。杭州在解决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冲突问题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作为现代化城市的典范,杭州把江浙地区乡村文化“请”进杭州城,在城市文化中融入乡村文化元素,进城的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也能找到儿时的记忆、心灵的慰藉。特别是杭州的西溪湿地,坚持有效保护和有效开发并举,既保留了20世纪70年代农村生活的现实场景和原有风貌,又大力推进城市形态、自然景观、城市产业、城市管理的有机更新,是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和谐发展的杰作,是现代化城市和乡村交相辉映的成功典范^[3]。杭州的经验表明,坚持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强势的城市文化既着眼时代要求,又兼顾乡村文化建设,使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共存共生。

(三)重构乡村舆论空间,扩大乡村文化影响力

挖掘乡村文化的遗产价值和精神底蕴。中国社会是以伦理至善为本位的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伦理关系涵盖了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个礼治社会,是由“波纹宗亲网”构成的呈现“差序格局”的礼俗社会^{[43]26}。尽管乡土社会的人文环境、社会结构、道德体系、血缘地缘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乡村仍然是“熟人社会”,伦理关系仍是人们沟通交往的重要遵循,人们自觉担负着各自的伦理位置与道德角色,并形成了共同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具体表现为地域性的民风 and 民俗,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人们,并将长时期影响乡民的情感处事方式、价值追求以及对社会的认知观点等,注重人情关怀、崇尚道德治理是乡村文化典型特征。”^[3]伦理文化是乡村治理的灵魂,通过深入挖掘伦理文化,发挥伦理文化的约束和激励作用,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重塑新时代乡村文明,重点培育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进而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同时,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开展移风易俗,重点推进农村丧葬习俗改革,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扩大乡村文化的发展空间。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存在总体水平低、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振兴乡村文化,要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要。政府应坚持资源下移,统筹建设集宣传、教育、科普、普法、体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要在乡村尤其要在村民中,利用重大节庆日等关键时间节点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组织开展各种类型的满足群众需要的、真正引领群众成长的、为群众所喜欢和接受的公共文化活动。要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扩大群众文化活动的空间。浙江将文化下乡的形式与农村本土文化内核结合起来,探索构建“大文化”集合体,不仅为群众提供了互助合作、参与管理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人们的公共精神,促进了群众精神家园的形成和乡村文脉的传承^[44]。



创新乡村文化传播方式。立足乡村实际,适应时代变化,回应乡民诉求,把乡村文化融入特色鲜明、群众喜爱的戏剧影视作品,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以县级融媒体中心 and 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建设为传播高速通道,推动乡村文化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如建立移动网络乡村文化展播平台,研究乡民移动互联网生存规律,主动提高文化教育的应变能力;建设移动网络上的乡村“文化家园”,使文化宣传工作更加生动有效。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乡村文化理论创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规民约和乡村道德体系,弘扬敦亲睦邻、守望相助、诚信重礼的乡风民风,并规范开展最美家庭、乡村教师、人民调解员等先进典型选树活动,实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共生。

(四) 重构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空间, 培塑乡村文化的创建者

人才是事关乡村文化振兴的决定性因素。乡村社会里“人是村落地方性意识的核心,是地方区别于其他空间的关键所在,更是乡愁情结的发起者和归因,是乡村文化复兴中最为重要的因素”^[45]。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去农文化”导致农本价值的扭曲和乡民心灵的荒漠,加剧了乡村人才资源外流,使乡村失去了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造成乡村传统文化的失语。费孝通1997年提出文化自觉论^[46],杜维明、乐黛云、盛宁等学者深入解读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乡村文化尤为如此^[47]¹⁷⁻⁴³。当前,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当前乡村普遍存在人才匮乏问题,要制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按照人尽其才原则,培养一批热爱乡村、素质优良、甘于奉献的优秀人才。要积极调动农民的能动性,加大对他们的教育引导力度,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他们自觉当好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建设者和践行者。

培育新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传统农耕时代文明的结晶,指的是心系乡村发展、热爱乡村建设、维护乡村秩序、塑造乡村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文化。乡贤来自乡村并反哺乡村,凭借人格、人脉、资源等优势承担起乡村产业发展、文化振兴和基层治理职能,对乡村发展有积极意义。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培育新乡贤文化,并强调了其在乡村振兴,尤其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48]。这为新乡贤文化的功能作了阐释和定位。新乡贤是能影响农村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奉献的贤能人士,扮演着桥梁、智库、榜样等角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乡贤文化是一种激励凝聚机制,意在激发乡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建设乡村建设的自治能力。创新乡贤文化,以乡情、乡愁为纽带,搭建聚贤平台,选聘乡贤担任乡村规划管理员、乡土文化辅导员等作为治理乡村、教化乡里的中坚力量,发挥乡贤为村两委班子出谋划策、协助联络和信息沟通等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就要不断创新乡贤文化,凝聚有意愿回乡的优秀人才,建设家乡,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传承乡村文明,推动乡村治理。譬如,2014年以来安徽省泗县选择了1000余名在群众中威望高的老干部、老党员、老军人、老教师和能人大户,成立“乡贤志愿工作站”,充分发挥他们在矛盾调解、民情联络、文明教化、村务监督等方面的独特作用,积极探索现代乡村治理新模式和传统文化传承新形式,构筑起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49]。

培育传统村落文明保护传承人。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不同村落,孕育

着各自的发展特色与区域特质,只有本地区或本民族的人才更加珍视区域内的村落文明。通过选育传统村落文明保护传承人,带动更多热爱村落文明的民间艺人发挥作用,扩大对外宣传力度,提高传统村落的影响力。应该看到,大多数乡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这也成为制约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障碍,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必须从提升乡民科学文化素质开始。教育是培育主体意识的有效方式,要加大对乡村教育的资金、资源和资本投入,增强群众的文化意识和主体意识。各级政府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加大对农民的科学素质普及工作,注重培养乡村文化能人。譬如,贵州重视传承奢香文化、阳明文化等地域文化,通过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打造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知名度和影响力,促使地域文化持有人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50]。

(五)重构乡村产业空间,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产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没有产业的农村,难聚人气,更谈不上留住人才,农民增收路子拓不宽,文化活动很难开展起来”^[51]。可见,文化振兴离不开产业。推动和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既需要文化产业的发展,也需要文化事业的繁荣,两者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才能不断地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生机和活力。因此,要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文化、休闲观光和乡村传统工艺,通过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吸引更多人到乡村就业创业、扎根定居。加强产业政策扶持,依托乡村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和生态文化资源,打造传统村落名优品牌,促进乡村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

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发展“文化+”业态,打造高附加值的业态集群,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将更多文化要素转化为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塑造“文创+农业+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丰富文化产品的供给类型和供给方式,使乡村成为旅游目的地。譬如,湖北省谷城堰河村确立了“种养结合”的循环经济模式,打造茶叶和特色种植产业链,建立乡村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互利共生的激励机制,有效阻遏了农村人口大规模转移和跨区域流动的现状,对稳定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共同体具有极大的益处。堰河村因此获得国家级生态村、全国文明村镇、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等殊荣,成为人们向往的好去处。同时,要正确处理旅游与保护的关系,根据村落的资源承载能力,制定旅游发展规划,不能过度开发,破坏村落原貌。文化和旅游部定于2023年开展“四季村晚”活动,鼓励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在农闲期间开展乡民自编自导、自演自赏的“村晚”,融合乡土文化、乡村旅游等元素,促进文旅融合,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活力,把“村晚”打造成反映农民精神新风貌、乡村振兴新气象的载体^[52]。

打造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作为一种特有的生产要素,不仅能为群众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而且有助于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一个好的文化创意,往往能够点石成金,实现乡村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实现指数级的增长。比如,文化创意既可以与现代农业融合,打造田园综合体;也可以与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打造特色乡村文化场所;又可以与工业融合,发展民间工艺品生产;还可以与旅游业融合,开发乡村文化旅游。浙江省横店镇坚持“政府规划设计,企业投资建设”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实施“影视城+”行动计划,激活乡村文化活

力,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53]。

(六)深挖乡村文化内涵,增强乡民的文化认同感

乡村文化始终是增强内部凝聚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54]。乡村文化内涵丰富,不仅包含了乡村本地人文,还蕴含着革命文化和现代乡村的旅游文化,我们应当挖掘、抢救、传承与发扬。乡村文化既内含着最基础、最基本的乡村生活和生产文化,又包含着广为流传的传统节日文化、民间信仰文化、社火游艺文化,还包含民间工艺文化、人生礼俗文化等,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乡村文化的时代内涵,激发文化主体力量,从而实现乡村文化发展。

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文化治理结构,加强和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物质载体与精神载体。国家和政府要从顶层设计上,加强制度的设计与规划,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与治理模式。从某种程度而言,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步^[51]。同时,要注重发挥调动中间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政府与乡民之间,建立新型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通过这些中坚力量进一步探索乡村文化的主要内涵,深入挖掘乡村生活和生产文化、人生礼俗文化、传统节日文化、民间信仰文化、社火游艺文化、民间工艺文化等,重新建构乡村精神文化家园,增强乡民的文化认同感。

深挖乡村文化价值,增强乡民文化自信。对乡村文化原有价值进行批判性思维,重新审视乡村文化价值之所在,重视乡村精神文化物质利益的实现,将这种实现惠及成乡民的经济收入,无论是非遗产品还是文创产品,再或开展乡村旅游等,都能实现效益最大化,乡民可以通过乡村文化的衍生品致富,这样就能重拾乡民自身对家乡文化的自信心,进一步增强乡民的满足感与获得感。

进行乡村文化认同意识培育。乡村是乡民自己的乡村,建设需要村民自己建设,文化需要乡民自己投注精力和物力,产生的文化红利由乡民共享。这样,一方面努力提升乡民自身乡村文化的价值认同,让更多有能力的乡民或在外人员为乡村文化振兴做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要强化乡村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多措并举、多方发力,通过提升某一地方、某一乡村乡民整体的文化认同、文化情感和文化信仰,进而提升整个乡村、整体乡民对乡村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四、结语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是破解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乡村文化发展不充分、乡村振兴乏力的创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24][23]}。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振兴乡村文化,其目的在于以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乡土文化,通过寻找现代文明要素和优秀乡土文化的契合点和结合点,将二者有机融合,挖掘和发现乡村文化的时代意蕴和时代价值,使历史悠久的乡土文明在新时代生生不息、永久流传、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优秀乡村文化,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乡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增强乡民凝聚力,引导乡民向上向善,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和源泉,是实现精神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农业因人类定居而兴,村落因农事活动而聚,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载体,也是广大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故土。”^[51]长期以来,我国广大乡村因生产方式、民俗文化、历史条件、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振兴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鼓励基层实践;既要强化政府引导,又要激活乡民主导;既要深化产业驱动,又要激发文化内生动力,依靠群众的智慧绘就乡村文化振兴的蓝图。对待乡村文化,既要承认其既有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又要尊重各个民族、各地农民新时代的探索创新,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推动乡村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动农耕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特色资源保护与传统村落发展良性互促,推动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文化兴盛繁荣。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65-73.
- [3] 胡剑南.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19(5):120-128.
- [4] 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0-26+152.
- [5] 刘忱.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J].中国领导科学,2018(2):91-95.
- [6] 胡惠林.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建设:从传统乡村走向现代中国乡村——三论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50-66.
- [7] 孙刚,罗昊.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与政策路径[J].江汉论坛,2021(7):85-90.
- [8] 李伟红,鲁可荣.传统村落价值活态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共融共享共建机制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8):187-195.
- [9] 廖军华.乡村振兴视域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J].改革,2018(4):130-139.
- [10] 鲁可荣,程川.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以浙江三村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22-29.
- [11] 高俊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基于湖南湘西州的调查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0):1-8.
- [12] 林青.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研究[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32-37.
- [13] 张继焦,吴玥.近年我国对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关系的研究综述[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3):56-61.
- [14] 唐钱华.乡村文化振兴中的移风易俗主题与政府角色转换[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14-22.



- [15] 宋靖野.“公共空间”的社会诗学——茶馆与川南的乡村生活[J].社会学研究,2019(3):99-121+244.
- [16] 申鲁菁,陈荣卓.现代乡村共同体与公共伦理文化诉求[J].甘肃社会科学,2018(2):18-23.
- [17] 沈费伟.传承家风家训:乡村伦理重建的一个理论解释[J].学习论坛,2019(9):71-77.
- [18] 王家合,杨倩文,杨德燕.以政府购买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共同体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23(5):149-151.
- [19] 梁若冰.文化自信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3):190-196.
- [20] 韩玉祥.建构意义世界: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2-21+101.
- [21]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22] 齐骥.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和思想范式研究[J].东岳论丛,2019,40(8):32-40.
- [23] 杨丽新.乡村文化供给的再组织化及其实践效能——基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前社区的考察[J].图书馆,2023(8):26-33.
- [24]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25]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24-03-01(10).
- [26] 胡彬彬,等.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27] 段雨.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多维检视:价值、困境与路径[J].图书馆,2024(3):50-57.网络首发时间:2024-02-20 13:14:19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43.1031.g2.20240208.2128.024>
- [28] 刘欢,田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3(4):59-65.
- [29]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30] 孙喜红,贾乐耀,陆卫明.乡村振兴的文化发展困境及路径选择[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35-144.
- [31] 王刚,黄鹏.公共性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善治逻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38-44.
- [32] 索晚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价值再认识[J].贵州社会科学,2018(1):4-10.
- [33] 方云.长三角传统工艺类非遗展陈审美叙事与江南文化认同建构——基于“江南客厅展”的研究[J].东南文化,2023(4):143-149.
- [34] 刘铁芳.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 [35] 胡彬彬.中国村落史(下)[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 [36] 祁润钊.传统村落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96-103.
- [37] 房静静.文化、社会与个人:传统村落保护实践的反思[J].兰州学刊,2019(3)178-185.
- [38] 蒲娇,张航.民俗遗产赋能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23(6):114-122.
- [39] 郑娜娜.激活乡愁: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传承与重塑[J].江苏社会科学,2024(1):146-155.网络首发时间:2024-01-29 16:16:11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32.1312.C.20240128.2231.016>
- [40] 段小虎,谭佳锋,李宪霞.需要的社会体系、历史序列与空间特征: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改革再认识[J].图书馆论坛,2018(6):11-15.
- [41] 周永红,易艳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的数字资源建设现状调查与思考:以“乡村记忆”工程为例[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7(3):10-15.
- [42] 陈苏,丁和根.乡土认同建构中的媒介力量:从有线广播视角的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0):155-159.

- [4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44] 浙江省社科院课题组.文化礼堂,乡村文化治理的创新范例[N].浙江日报,2017-04-24(004).
- [45] 麻国庆.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的多重面向[J].求索,2019(2):4-12.
- [46]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 [47] 刘海平.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东亚视角[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 [4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001).
- [49] 何雪峰,李陈续.让乡贤文化发挥更强道德张力——安徽省泗县凝聚乡贤力量涵育文明乡风[N].光明日报,2016-04-11(004).
- [50] 刘洋,肖远平.乡村文化建设的四维建构与振兴策略——基于贵州的典型经验[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7-25.
- [51] 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求是,2023(6):4-17.
- [52] 韩业庭.文化和旅游部:2023 年开展“四季村晚”活动[N].光明日报,2023-03-21(009).
- [53] 郑芳,屠志芬.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困境、契机与模式探索[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2):17-24.
- [54] 刘如梅.文化治理现代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抉择[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2):72-77.
- [55] 何睦,何于一,任源钢.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J].重庆社会科学,2023(6):80-90.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Pei Xiaotao

(Zhengzhou Business University, Marxismcollege; Henan, Zhengzhou, 451200)

Abstract: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erving as its soul and a prerequisite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is facing a crisis of disorder and a severe challenge to its self-confidence amidst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o promote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crucial to recognize, respect, and promote rural cultu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innovativ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ecological, cultural, public opinion, subject,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 It is also crucial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rural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fostering new types of farmers and new rural culture, and providing high-quality cultur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Ultimately, the goal is to achiev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易晓艳)

